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唐宋诗词鉴赏

TANGSONG SHICI JIANSHANG

王步高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唐宋诗词鉴赏

TANGSONG SHICI JIANSHANG

王步高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鉴赏/王步高主编.—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8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ISBN 978 - 7 - 301 - 06330 - 9

I . 唐… II . 王… III . ①唐宋 - 鉴赏 - 高等学校 - 教材 ②诗
词 - 鉴赏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I 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435 号

书 名: 唐宋诗词鉴赏

著作责任者: 王步高 主编

策划编辑: 杨书澜

责任编辑: 李廷华 舒 岚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06330 - 9/I · 06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weidfo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15.25 印张 42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编委会主任：季羡林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学部委员，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委 员：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名誉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推荐《大学语文》教材主编。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执行主编：张耀辉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

质量总监：乔征胜、江溶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狭窄，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

季羡林



人类必须学会和谐友好地共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民要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帮助，寻求理解、宽容与尊重，共同建设和平民主、平等繁荣的新世界。

戴逸



大学生需要吸取全人类文化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对我们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积累，则更应有广泛的理解，并加以发扬光大。具有宽厚的人文根底，肯定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徐中玉



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汤一介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的生活解析为：外物诸善（指物质生活）；躯体诸善（指健康、精力）和灵魂诸善（包括知识、信仰、友谊、荣誉、自尊、爱和被爱等）。当我们致力于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的生产者和一个快乐的消费者时，往往忽略了对于灵魂诸善的追求，那样的人生显然有很大的缺陷。愿这套丛书能将读者引向对灵魂诸善的关怀。

乐黛云

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爱因斯坦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部分书目

书名	编著者
《大学新语文》	夏中义
《实用写作》	张耀辉
《影视艺术鉴赏》	吴贻弓 李亦中
《中国古代小说名著鉴赏》	焦垣生 张 蓉
《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	尉天骄
《中西文化比较》	徐行言
《唐诗宋词鉴赏》	王步高
《音乐鉴赏》	钱仁康 胡企平
《美术鉴赏》	陈洛加
《艺术鉴赏》	凌继尧
《简明西方哲学史》	赵敦华
《中国哲学简史》	李中华
《艺术与科学》	沈致隆

总序

汤一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文精神是特别重视的。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经非常注重对人的人文精神的教化了。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教化的经验，例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修养德行；不讲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而不能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虽能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能严重地损害人类社会。今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造福人类的；那么，我们如何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就是要用人文精神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修德”不容易，那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要天天提高自己，而且要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不断前进。“向

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做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只有做到这些，科学技术才不会脱离为人服务的根本目的，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需要用人文精神来加以引导。

在当今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竞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我们的国家要坚强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应该合乎道义。可是面对我们国家的现实，有些人往往为了赚钱，取得高额利润，见利忘义，不顾及社会福祉，不讲信义，甚至做出坑害人民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除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外，最主要的就是缺少一种可贵的关怀人的精神，缺乏关怀人的精神的教育。我们做一切事都应“以人为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离开这一点，发展、赚钱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发展经济应“以人为本”，那么，在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应处处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这就需要有一种关怀人的人文精神，并对全社会进行关怀人的教育。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大学生是建设富强、繁荣的中国的生力军，我们国家未来的健康、合理地发展就要靠这批大学生，因此，使他们受到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必要。我们的大学生当然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担当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首先应关怀人，关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做一个有理想、讲道德，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有人文关怀的人。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在大学生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序

王步高

序

五千年的中国文学，犹如绵延之群山，在唐宋时期奇峰突起，形成唐诗、宋词两座高峰。因为它们的成就，中国才当之无愧地被誉为“诗国”，诗词才成为中国文学最辉煌的部分，《诗经》、唐诗、宋词加《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可以“颉颃西域”^①的主要资本。

唐诗是由六朝及隋诗发展而来，唐代的政治制度、文学受隋代的影响较深。因此不得不略加说明。

北周、隋、唐的统治者不仅政权先后相袭，而且大致均采取了近乎政变的方式，隋唐之际有些战争，但大多并不发生于隋唐政权之间。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统治者均系关陇贵族，三个皇室还有着十分密切的姻亲关系。宇文泰、杨忠、李虎分别是这三个皇室的创始人，他们与独孤信曾一起在西魏做过高级将领，前三人之子宇文毓（北周明帝）、杨坚（隋文帝）、李昞（李渊之父）分别娶了独孤信之长女、七女和四女，而杨坚之女又嫁与宇文衍（北周静帝），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也属姨表兄弟。隋文帝在中央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礼、吏、兵、刑、户、工），改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两级，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明经、进士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等均为唐代继承并加以发展。隋诗对唐诗的影响亦然。

隋代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却二世而斩，历时仅三十七年。因此，隋代有影响的诗人不多，作品总量也

^① 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原话为：“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差可颉颃西域。”

少。文学史家往往将之视为南北朝之延伸而一语带过。其实,这恰恰忽略了大一统政局对诗坛的影响,忽略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歌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格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起衰中立”一语本为清人沈德潜用以评论杨广(隋炀帝)、杨素边塞诗历史作用的(见《说诗晬语》),以之来说明隋诗的历史地位倒颇为恰当。

从隋朝统一中国以后,南北诗风便开始融合的过程。隋代是以北朝诗风为主体吸收齐梁以来南朝诗歌格律化成就而形成的融合,而初唐则是以南朝诗风为主体吸收北朝贞刚之气的另一种融合,至陈子昂、李白以后,这一融合才基本完成。魏征曾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魏征期望的这种南北诗风的融合,直至盛唐才得以完成,也确实导致了唐诗的空前繁荣。而隋诗研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隋诗数量虽不算很多,但题材相当广泛,特别是隋代的乐府诗,上接《诗经》、汉乐府和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隋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与梁陈宫体诗有很大的不同。宫体诗写宫廷中饮食男女之事,不乏卑下色情的描写。如梁简文帝萧纲诗中,多写内人卧具、内人昼眠、伤美人、娈童、倡妇怨情、美人晨妆……此外如《行雨诗》则更是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这样的作品,在隋诗中已基本绝迹。以荒淫闻名的隋炀帝,其诗却很典雅庄重,没有这类作品。魏征说得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国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为什么这样一个淫荡昏庸的皇帝也能写出一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健康作品,这不能不归于隋代诗坛

风气的影响。^①

经过隋末的几年动荡，唐代才真正建成长治久安的大一统王朝，经济也高度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626—649）励精图治，史称‘贞观之治’、他知人善任，虚怀纳谏，重视吏治，轻徭薄赋，节俭自持。高宗李治在位时，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号皇帝。其时政局虽然纷纭，但社会仍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开元年间国势强盛，史称开元之治。”“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河朔三镇尤著，形成了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中则出现宦官专权和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顺宗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进行政治改革，由于宦官集团反扑而失败。唐文宗时甘露之变，宦官诱杀大批朝臣。朝臣之间也有以李德裕为首的一方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方的所谓牛李党争，纷纭至半世纪之久。”^②（笔者本人并不赞成此观点，有“牛党”，并无“李党”。）唐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东部平原的官吏，取代了西北贵族，其文化底蕴深厚，且多南朝文化的特点。

唐代经济也高度发达。同时唐朝广开言路，政治开明，从不以言治罪（唐朝没有知识分子因写诗而被治罪的）。唐王朝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得以交流，各种宗教得以传播，思想空前解放，统治者（除唐武宗曾有灭佛之举）基本只倡导什么（如太宗对佛教、玄宗对道教），而不钳制什么。加之唐代科举制度广泛推行，考前考生得向名人投献自己的诗文（当时称“行卷”），甚至考排律，这客观上也推动了唐诗的兴盛。

从文学角度而言，唐诗继承了《诗经》以来近二千年的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五七言近体（格律）诗的成熟使唐诗较之前代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一般认为五律到沈（佺期）、宋（之问）时已定型，七律到杜甫才最终定型（杜诗七律则仍有少量失粘、失

^① 以上引自王步高《研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

^②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册》，第10页。

对或拗句)。七言古诗中的歌行体盛行,也使唐诗的表现力有所增强。所谓歌行,本由乐府而来,“由乐府诗发展为古体诗中独立的一体”,其特点是不入乐,也不沿袭乐府古题,采用五七言或杂言,音节格律要求自由,篇幅可长可短。《唐诗三百首》共八卷,五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均为一卷,独七言古诗竟多达三卷(有一卷专收七言乐府),这不能不说与歌行兴盛有关,其中名篇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兵车行》等皆然。到中唐时,更出现一种“元和体”,在歌行中杂入许多律句、对仗句,几句一换韵,其中每四句常是一首律绝,如白居易《长恨歌》与《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为其代表作。唐代的诗歌理论对唐诗的兴盛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的理论、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推动当时诗歌创作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过去几十年对这种作用认识有点夸大)。

唐代历时 290 年,流传至今的诗远远超过唐以前 1700 年之总和,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两书统计,有诗 53035 首,诗人 3276 个。陈尚君教授《全唐诗续拾》又补诗 4300 余首,涉及作者 1000 余人,剔除重复人名和诗作,唐诗总量为 55000 余首,作者 3500 余人。其中能开宗立派的重点诗人达 20 余人,著名诗人 100 余人。同时涌现出李白、杜甫等超一流的大诗人,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

唐诗就形式而言,也集其大成,古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七言还发展为歌行体,中唐又发展为元和体,乐府又发展为新题乐府。尤其是五七言律绝,到唐代定型,成为官定考试及竞赛的诗体,人人能作,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六言诗、词在唐代也时有创作,至五代时词已蔚为大国。

唐代诗人敢于直面世界,直面人生,思想内容充实,其中如杜甫、白居易、张籍、王建、李绅及晚唐一些诗人,继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许多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诗句,对社会的矛盾,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人民的深重灾难都有真实而深刻的反映。杜诗被称为“诗史”便是明证。也有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李益、卢纶等一大批边塞诗人,既歌颂边塞将

士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对穷兵黩武的最高统治者也不乏鞭笞与讽刺。还有更多亲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诗人，以亲身所历，亲耳所闻，记录下许多家国和身世的辛酸。而以李白为代表的诗人，以豪迈的诗歌歌唱理想、歌唱豪情逸兴，成为“盛唐”之音的主旋律。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储光羲为代表的诗人，淡于功名，流连山水田园生活，也写下许多美学价值极高的诗篇……

对唐诗的成就，胡应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谐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薮》外编卷三）诗歌的各种艺术手法，至唐也已臻于完备，司空图归结为《二十四诗品》，虽主要就艺术风格而言，实际也是对唐诗艺术的全面总结。

二

中国文学分为韵文（诗、赋、词、曲）、散文（散文、小说等）两大类。而韵文又分齐言与杂言两条发展线索：

齐言：四言（诗经）—五言—七言（另有少量六言）

杂言：古歌谣—楚辞—乐府—词—曲—有韵新诗

 |
 赋

词是杂言诗（乐府）格律化后的产物（详见附录：《论词的起源》）。它是格律化的杂言诗，它与格律诗几乎同时孕育发展起来的（均可追溯到六朝的齐梁时期），但它的兴盛却晚得多。也许这一点还值得深入探讨，有一点是无疑的，词在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心目中地位要低得多，不仅科举考试与词无缘，唐代多数知识分子也很少涉足这一领域。温庭筠之前，不仅没有专业词人，写词较多的作家也没有，大家充其量只是以诗之余作词。诗余之名虽遭到许多专家的反对，却是反映了词在其成熟前后一段时期的真实处境的。到晚唐五代时，由于温韦及南唐二主的介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词产生的早期,其反映生活的面还是较为广阔的,敦煌词便是如此。虽然它距离俞平伯先生说的“广深”(题材内容广泛,反映社会生活、思想也深刻)还有较大距离,但与后来词走的“狭深”(题材较狭窄,但反映得较深入,有一定深度,在这狭窄领域甚至超过诗)道路比,它并未把自己圈得太死。

词虽与格律诗几乎同时起步,其成熟之作却至少到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时才出现(关于这二词的真伪至今还未完全定论),此后刘长卿、韦应物、张志和都有一二名作传世,但直到中唐后期白居易、刘禹锡、王建等加入进来,才开始成点气候。而且有了刘、白同题唱和之作。

“花间词”不论在后世遭遇多少批评,它却为五代、宋的文人词发展大致规范了其题材、风格、发展的道路,温韦成了历代文人词的鼻祖,婉约成了词之正宗,反之苏辛词则成了“别调”,下至明清,这一情况也未有根本改变。花间、南唐两个词的创作高峰,展示了词的艺术魅力,吸引有才能的诗人纷纷涉及词的领域,到了宋代完全不写词的诗人便不多了。既是大诗人,又是大词人的便不在少数。

宋代是自汉末以迄明清历史最长的一个朝代。它的建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主弱臣强,藩镇割据,“残民如草,易君如棋”(俞陛云语)的局面。

宋代采取削弱节度使的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中央,用文臣知州事,用通判来掌管军政民政,在各路设转运使来掌财权,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将领不专领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削弱宰相之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只管民政,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又提高御史台、谏院部门长官的权力,作为皇帝的耳目。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分领。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皇权,既无藩镇,亦无强臣,朝廷的统治大大巩固,除南宋时发生过一次苗傅、刘正彦之乱,没有其他政变。由于兵将分

离、内外相维、守内虚外等一系列政策，也导致国防空虚，先后受制于辽和西夏、金、元。

宋代优待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唐代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20倍，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可能进入仕途。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宋的疆域小于唐(南宋更小)，“官五倍于旧”。

宋朝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不让地方对抗中央。司马光论正统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说，散文家又倡“文统”说。道统、文统虽首倡于韩愈，而行于宋。

重文人导致宋代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古代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均出于宋代。思想的钳制，使宋代不少文学家都有过坐牢的经历，导致与官场关系密切的文体，如散文、诗歌较多受这些思想的束缚，而“词为小道”、“词为艳科”，在宋代统治者及士大夫心中，词不登大雅之堂，也就不在上述思想禁锢之列，加之宋词题材“狭深”的特点，因而士大夫厌倦了诗文中的官样文章之后，均到词的领域来放松一番，来一试身手，驰骋情感，施展文才。唐诗在诗的领域竖起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宋诗虽流传至今的作品总量远超过唐诗，但思想的禁锢使宋诗超越唐诗几乎不可能，虽然苏轼等人的才气并不在李、杜、韩、白之下。相反词却较少受统治思想的影响。明清时(特别是明代)，文字狱极盛行，得以特别兴盛的只剩下不为统治者看重的小说和戏剧(《四库全书》完全不收)。

宋代国势削弱，外族欺凌，词人怀抱抗敌立功之心抒发报国之情，南宋时更痛心家国之沦亡。这些方面词并不逊色于诗，岳飞的《满江红》使人振奋发聩，诗中还难以找出与之匹敌的篇章。

宋代士大夫对音乐的爱好及其能自度曲也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柳永集中慢词几达三分之二，多为自创；其用词调一百二十多个，运用前人的仅几调，其他全属自创(也可能有一些柳永之前有人用过，但今其作品已失传)。张先也自创过许多慢词。周邦彦也是精通词乐的高手，也自创不少词调。南宋时姜夔自度曲颇多，至今还有十七首留下工尺谱，是流传至今的宋词仅有的词

乐。史达祖、吴文英也都能自度曲。据说杨缵、冯艾子也能自度曲，惜乎很少作品流传至今。

以上种种，使词在宋代这块并不算特别肥沃的土壤里得以生长、发育，并长成参天大树。

词行诗道，诗词艺术是难以完全分清彼此的。

北宋虽有柳永、张先之慢词，苏轼对词之大胆革新，但北宋词仍以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词人为主流。南宋虽有南渡词人、辛派爱国词，周邦彦格律派的影响仍有较大影响。“杭州”与“汴州”之间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两宋词题材不及唐诗开阔，虽经柳永、苏轼的拓展，但反映民生疾苦、叙事（如《长恨歌》）、包括写战争动乱等方面，较之唐诗少得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然而写爱情、相思离别、风花雪月，或咏物等方面，不仅较之唐诗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成功。从本书附录的一些作品便不难看出，将之与本人主编的《唐诗鉴赏》比较一下便更不难看出。

宋词虽成就很高，但总量不多。据我的导师唐圭璋教授《全宋词》，宋词总量还不足 20000 首，近年人们零星辑补到数百首，勉强凑足两万之数。而陆游一人竟存诗近万首，杨万里据说写诗更多（目前存 4000 多首）。词为长短句，可以重章复沓；而且词调众多（《词谱》收 800 多调，2700 多体），有的高亢，有的愤激，更多的婉转悠扬，适合抒发各种感情；字数也长短悬殊，从 14 字到 240 字，因而有很强的表现力。宋人将词的长处发挥到极点，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宋词以婉约为主流。“婉约”是词的当行本色。“豪放”是别调。婉约词题材较狭窄，大多是爱情、离别、思乡、咏物等传统内容，语言流丽而典雅，音韵谐婉而妩媚，有一唱三叹之致，却易陷于贫弱或为文造情。豪放之作在饱经政治沧桑或身经家国之变的作者笔下，“大声镗鞳，小声铿锵”，或作金戈铁马之声，或指画山河，作激浊扬清之论，但易流于叫嚣，而有粗俗之病。两宋词坛，名家辈出，堪称大家者，亦指不胜屈。北宋柳永、晏殊、欧阳修、晏几道、贺铸、周邦彦及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堪称婉约正宗，而